

金融强国的核心标识：强大的货币与央行

张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①。这“六个强大”是关于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要义。在“六个强大”中，前两强即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可以说是金融强国的最核心标识，是金融强国的纲；后四强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是金融强国的目。这里，我想主要就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做一些分析。

一、世界金融史中的强大货币与强大央行

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集中体现。曾经的荷兰盾、当年的英镑以及当下的美元，一方面述说着国际储备货币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金融强国（霸权）的兴衰更替。

荷兰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储备货币。17世纪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集聚地。以前来自西属美洲的金银通过贸易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运往阿姆斯特丹，并被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存入银行。这些金银在为世界贸易体系提供支付手段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各国的贸易赤字大多是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金银储备支付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银储备在稳定荷兰货币币值以及促使其成为“世界货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姆斯特丹银行掌握了整个欧洲的借贷，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提供稳定的物价和保持金银两种货币之间固定兑换比例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18世纪60年代，各国纷纷向荷兰借款，其中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选侯、再三举债的丹麦国王、瑞典国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法兰西国王、甚至汉堡市（当时还是荷兰强劲的对手），最后还有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洲起义军。^②

英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是因为它保持着与黄金可兑换的稳定性，而金本位制正是实现这种兑换的重要保证。实施金本位制对英国经济乃至以后的国际金融体系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英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历史并不算短，从1717年牛顿将黄金和英镑价格固定，到1816年正式从法律上确定这一制度，经历了一个世纪。这期间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工业革命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月17日。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73页。

和“金融革命”的促进,也离不开金本位这一稳定货币制度的支撑。坚持金本位并向全球推广,扩大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由此形成了以黄金为基础、以英镑为世界货币的国际金本位体系(1870—1914年),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货币体系。英国于1870年以后将金本位制推广到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在内的更广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衰落。国际金本位体系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在其鼎盛时期,4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英镑结算。英镑作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性对于英国作为强国的意义至为关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强调的,“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有时经由坚船利炮的恐吓来获得其支配地位,然而,它更经常的是通过适时牵引世界货币网络的绳索来大行其道的”^①。

1944年7月,弥漫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硝烟尚未散去,44国代表便云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讨论创建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英国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旨在弱化主权货币的“凯恩斯方案”,但最终通过了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方案”。“怀特方案”中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了各国拥有主权货币的格局,并追求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核心。这反映了美元当时已经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事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内容在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至此,美元取代英镑坐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头把交椅,成为其他各国主权货币的“锚”。1971年后,“特里芬难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成为真正的信用货币。美元与黄金脱钩、凭借自身信用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这和英国当年的英镑与黄金挂钩、靠主导国际金本位体系来行使英镑霸权有着根本不同。美元凭借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及美欧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计价手段、交易中介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等职能,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强大货币的威力。

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强大的货币是本国央行成为全球央行的前提;另一方面,本国央行的有效管理则成为强大货币的保证。

历史上英格兰央行曾保持了英镑币值的长期稳定。按布罗代尔的说法,英镑自1560—1561年前后(早于英格兰央行创立100年)被伊丽莎白一直稳定下来,维持了300年的币值稳定。这不仅确立了英镑的货币霸权地位,还有助于提升英国国债的公信力,货币和国债在国际市场上信誉良好为英国成为金融强国奠定了基础。央行的职能不只是维护币值稳定,事实上,随着英格兰银行开始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央行也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维护者。这两项重要职能都是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支撑。

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被赋予了四大职能: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建立全国清算支付系统、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以及对银行业实行监管。自此,美联储成为美国央行以及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机构。尽管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更多的是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联储因为美元的强大而成为全球央行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今,美联储的一举一动甚至任何一个措辞的微妙变化都可能引起全球市场的波动,而联邦基金利率也成为其他各国央行的参考基准。虽然各国都希望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效应仍然足够强大,进而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金融周期。当然,美联储也不只是坐享其成,它在维护美元霸权方面也不遗余力,这包括通胀治理、美元汇率的管理(包括干预汇率的谈判、汇率武器)、美元互换网络,以及借助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来实施控制和影响等。

二、强大货币与强大央行：本质在信用，保障在制度

从理论角度来看,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本质在信用,保障在制度。货币的本质是信用。

^①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从货币的演进来看,从贝壳、金银到纸币以及电子货币,从商品货币到信用货币,这些都体现出货币最终所代表的是一种信用关系。人们接受货币是基于一种信任,即相信他人也会接受这种货币。因此,《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认为,货币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基于信任。

一国拥有了强大的货币,就意味着该国拥有了强大的国家信用。因为这个时候,本国的信用就成为全球信用。无论是发货币还是发债,都会被全球所接受。因此,储备货币国的信用就可以被用于动员全球资源(储蓄),从而体现出金融“无中生有”的神秘功能。这里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巫术或炼金术,而是借助信用的“无形”,“生出”其调动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能力。一个更一般的例子在于:在全球债务总量中,有70%为发达国家所有,有30%为发展中国家所有。这就体现出发达国家的信用,即可以借更多的债,并且其发债成本比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由此形成的信用利差反映了不同经济体信用的差异。美元因为有着美国强大经济基础与综合国力的支撑,具备强大的信用,从而无论是美元货币还是美元债券,都被认为是全球安全资产,从而为全球投资者所追捧。

不过,信用并不是靠国家的宣称就会维持,而需要制度保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大约在1000年前,交子就已在四川地区的市面上流通。纸币的实际价值需要政府信用以及相关制度安排来维系。这里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府能否确定稳定币值的目标以及控制纸币的流通量等。但在王朝面临财政困难甚至财政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增发纸币来填补财政窟窿的诱惑便无法抵御。事实上,即便有精英人士意识到需要控制货币超发,当时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于是导致后来的货币滥发,国家信用丧失,不可持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在这1/4的世纪中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与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但在1973年,美元-黄金本位制崩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从此,美元经历了价值波动与国际地位的起伏。美元的第一次贬值从1971年开始,美元国际储备地位也相应转入下行周期,从1976年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86.6%的高份额,到20世纪80年代末占比不足60%。在此期间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地位不断攀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大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分别达到19.1%和9.4%的峰值。1995年,美国财长鲁宾对外推行强势美元战略,到2001年,美元保持稳步升值态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稳步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重回70%的历史高位。

无论是西班牙、法国历史上的赖账,美国的“尼克松冲击”(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纸币超发,都是因为缺乏制度保障(比如对于政府的硬约束)而导致国家信用的丧失或不稳定。而英国之所以成功——运用国家信用赢得了战争、推动了工业革命——则在于“光荣革命”后对于王权的限制。缺乏财政纪律约束的政府往往会滥用国家信用,从而使其逐步丧失可信度与可持续性。因此,尽管鼓吹赤字货币化的现代货币理论(MMT)颇为流行,但鲜有政府宣称自己会这么做;不少国家设置了赤字率门槛,美国国会还给政府发债设置了债务上限。这些均表明,国家信用的维护需要制度保障,包括对王权或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央行在维护币值稳定方面的决心和能力,这是历史经验和教训换来的。

三、强大货币与强大央行的实践路径

就中国而言,拥有强大货币与强大央行,将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既需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①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基,也是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的基本前提。荷兰盾的世界货币地位建立在荷兰的经济特别是贸易强国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积累财富,荷兰的货币通过大量金融创新以及服务国际贸易方式向海外拓展。英镑的崛起并取代荷兰盾成为世界货币,则基于英国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世界工厂地位。美元的强大则依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体量占世界比重超过50%,比所有其他国家总和还要多;科技实力方面则一直执世界之牛耳;综合国力世界第一。强大的经济基础成为金融循环的有力支撑,有利于吸引全球金融资源,并为强大而稳定的货币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②因此,货币与央行的强大,以至金融的强大,还要依赖于经济的强大。就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以及为金融强国建设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而言,未来我们还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由此不断增强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其中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尤为重要。

二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大央行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央行的政策实施应主要基于规则(rule-based)、目标清晰(无论通货膨胀目标、名义GDP目标还是就业目标),这样有利于央行建立可置信承诺,货币政策效果也会更好。在此基础上,央行要以维持币值的内外稳定(即通胀水平的稳定和汇率水平的稳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我为主”:对外,努力减少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对内,不要被诸多其他目标所影响或干扰。推动国债作为重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产定价中的重要作用。丰富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五篇大文章”。

三是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扩面增量,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应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稳步推进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基于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加强与周边和东盟国家本币结算(LCS)合作。推进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支持境外国家和地区发展当地人民币外汇市场。在资本账户不宜全面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可构建一个高水平、全面开放、包含境内和境外两部分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从而使风险更可控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开放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2024年1月16日。

^②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并讲话》,新华社,2019年2月23日。

提高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着力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吴卫星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形势下我国金融系统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面临许多新的任务和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是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特别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并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未来金融工作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是要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要在提高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基础上,大力提高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一、中国金融系统跨境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近年来,我国金融系统一直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吸引了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同时我国金融系统一直在努力提高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程度,尝试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第一,我国不断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我国金融系统不断推进“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联结更加紧密。对投资者来说,金融市场联结有利于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担,同时有利于相关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发现;对特定行业来说,金融市场的联结有助于科学技术、管理技能以及行业信息等的扩散,进而促进相关行业的创新发展;对企业来说,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结有助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实现投融资目标,并有利于企业能够获取更多发展相关的信息,帮助企业优化生产经营决策。

第二,我国金融服务供给逐渐被国际投资者认可。自2017年以来,我国A股逐渐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标普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等指数体系,我国债券也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富时罗素等推出的一些主要国际债券指数。这些指数往往被认为

是“全球投资者风向标”,大量国际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以这些指数为绩效评价和跟踪标的来进行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被纳入这些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际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投资价值的认可,也代表着国际投资者对我国金融系统监管和治理水平的认可。同时,被纳入这些指数之后,我国相关公司在国际市场融资将有更多可能性,有利于整体上降低这些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

第三,境外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机构进入我国的规模和范围均在扩大。过去十余年间,我国稳步扩大金融开放,外资对中国资产需求稳步增长,外资对我国证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配置均逐渐提升。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层也从政策上不断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自2020年起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于存托凭证、股票期权、政府支持债券等。近年来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范围已从境外央行类机构、人民币境外清算行和参加行,扩大至境外持牌金融机构以及养老基金等中长期投资者;熊猫债发行主体扩大至外国政府类机构、国际开发机构、境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截至2024年1月底,境外机构持有我国债券达3.87万亿元,近几年的年均增速也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国际形势变化对金融市场开放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国际金融市场分割的苗头性倾向值得充分重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有所放缓。不同国家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对是否应该大力推进全球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出现了不同的判断。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意识到了境外金融风险的冲击有可能对本国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于是选择不断加强对境外金融风险的监管,事实上造成了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割。一些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分割在短期内可能对一些行业领先者保持其现有领先地位有一定作用,但长期来说可能有负面影响。从金融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金融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首当其冲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因此放缓。但如果从隔离金融风险国际传染的角度来说,一定程度地加强跨境金融监管是有道理的,这里存在一个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协同问题。分析这一协同问题的关键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愿景是希望达成全球各国共同发展目标,还是让治理体系更加偏向于部分国家短期利益而有益于全球发展。

要预防各国由于过度担心国家安全而使得原本针对国际金融风险传染的监管措施加深全球金融市场分割程度。俄乌冲突发生后,以北约为主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制裁。2022年2月,美国和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禁止部分俄罗斯的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客观上使得俄罗斯金融系统与国际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割。随后,一些有影响力的股票指数将部分俄罗斯公司股票剔除。2022年3月2日,德国指数运营商Stoxx宣布将61家俄罗斯公司从其指数中剔除;随后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指数、MSCI等主要指数体系均开始将一些俄罗斯股票剔除出其指数体系。另外,部分有全球影响力的评级机构也下调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2022年3月3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将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理由之一在于美欧等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严厉制裁可能会削弱俄罗斯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这些措施一方面可能会被认为是战争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让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未来感受到更大

的不确定性。

就中国而言,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中国的科技投资尤其值得关注。2021年,美国参议院提案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NCCDA)提出设置“国家关键能力委员会”来审查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的投资。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指数公司也以各种理由剔除一部分中国股票。标普宣布,从2020年12月21日起,把10家中国企业移出其股票指数,并决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把18家中国企业移出其固定收益指数。英国富时罗素公司和美国指数编制公司MSCI也先后剔除了多家中国公司的股票。面对这些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我国需要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倡议和推动构建更为公平、更具可预测性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

全球金融市场使得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总体来说有利于所有国家。国际化分散投资往往会使得投资者对创新失败有更高的容忍度,投资者构建国际化投资组合会使得较高比例投资者有更长的投资期限,同时国际化投资有助于科技管理知识以及行业信息等的扩散。也就是说全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人类社会能够更加快速和平稳地取得创新性成就,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际金融市场分割让每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价。一是国际金融市场分割会使得上市公司股东库变薄,企业融资能力下降;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分割使得企业信息搜集能力变弱,决策能力下降,长期盈利受到影响;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分割会使得市场价格发现能力下降,有效率的企业难以脱颖而出;四是国际金融市场分割也会使得市场稳定性发生变化;五是最为重要的,即国际金融市场分割使得金融市场支持创新型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能力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当金融市场分割出现时,尽管较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在资源统筹能力和市场效率等方面也受损,但较小规模金融市场的效率受影响可能更大,这对不同国家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对各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也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一直较为稳定地排在全球前列,但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过去数十年间很好地服务了本国实体经济成长。但总体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相对美国而言还较小,吸引国际投资者的能力还需要显著提高,同时市场流动性需要继续提升,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纽交所自1792年成立以来,多次通过兼并等方式扩大其规模。2007年3月,纽交所与欧洲证券交易所合并组成纽约-泛欧交易所,后来又先后和其他交易所合并,规模不断扩大,其市场流动性、价格发现能力、资源统筹与优化配置的能力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当然,规模不完全意味着优势,规模和市场主体多样化程度增加的同时,监管成本也有一定增加。也就是说,为了给更大规模的市场建章立制,其成本不免会增加并转移到企业。总体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效率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希望能够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三、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提升有利于提高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

面对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金融市场,我国依然要遵循独立自主

的发展思路,努力提高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变化,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一,我国要继续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整合,不断降低运行成本,努力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我国金融系统要致力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体系,全力打破国内市场的分割,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确保监管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性,避免监管套利和市场分割;同时致力于完善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信任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监管有一个规模-成本平衡问题,一般来说金融市场规模越大,为了让市场参与各方满意往往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监管和运行成本。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不断推进改革,要基于我国金融市场实际规模和运行效率,在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和降低企业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才能真正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帮助我国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实体经济成长。金融系统只有更有效率地服务本国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潜力才会更高。

第二,要致力于参与推动改进和创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积极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要尽力促成更多国家达成监管理念、手段和方式的共识,维护公平竞争,避免监管套利,同时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构建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国应与其他国家在不同范围内寻求共识,建立双边和多边金融监管合作机制,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加强在跨境金融活动、金融创新产品、金融风险防范等领域的合作,争取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避免由于对国家安全的过度忧虑而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协同性降低和不确定性增加。

第三,我国企业要积极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金融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我国应该在国际支付和结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评级机构和其他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在内的国际金融中介服务以及能够体现真实市场运动趋势的指数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我国企业的作用,为全球提供更多优质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核心指标是信息效率,我国一部分有能力的金融机构也应该致力于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准确、全面的金融相关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帮助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第四,我国金融市场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要预防极端变化,对资金的跨境流动有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对跨境金融服务的制度建设,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安全限制和管理办法,争取做到促进竞争,又体现对国家金融安全的维护;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金融监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监管技术创新,及时发现和应对金融风险,有效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跨境服务能力。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人才支撑体系

李建军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金融已然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纵观大国发展史,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崛起无一不伴随着强大的金融体系做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经历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历程。在此背景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并强调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那么,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是什么?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金融强国所具备的关键核心要素包括“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前五大关键核心要素事实上都需要依靠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金融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中都做了重点阐释。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在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因此,明确金融强国背景下强大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和方向,认识中国金融人才队伍的现状,剖析当前金融人才培育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金融人才培育机制,对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保证

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第一资源和根本保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在于金融强国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相关领域专业人才队伍的壮大,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型专业人才。在强大的货币方面,其关键在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中的使用。而上述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便利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的优化和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立等具体举措。此类场景往往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金融部门交流和协作,对金融人才的国际化水平提出

了更高要求。在强大的央行方面,其不仅要求央行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同时还要求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经济稳定,而提高央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维度之一便是培养和选拔出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型专业人才和中央银行家。此类人才一般应具备在国际金融组织机构、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财政部等重要系统的工作经验,在重要岗位进行过历练。

第二,强大的金融机构需要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管理型与技能型专业人才。金融机构的强大表现在多个维度,既包括金融机构具有强大的经营能力、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也包括多层次、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强大的经营能力要求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拓展、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持续稳健耕耘;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则表现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包括事前风险防范和事后风险化解能力。金融机构上述能力的建设要求金融人才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管理才能。此外,多层次和国际化对应中小金融机构扎根本土、进行特色化经营的能力,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参与跨境金融服务、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能力,而此类能力的实现依赖具备特色化和国际化能力的技能型专业人才。

第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足够的能应对全球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实战型专业人才。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包含众多维度,如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一流的金融机构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其中,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发达的金融市场既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的充分发育,也包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定价的影响力,还包括金融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功能、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互联互通水平。相较于金融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金融市场往往对于信息的反应更加灵敏,市场价格的变化和波动中蕴含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建设过程中的风险也相应更大,亟须一批能够从容并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实战型专业人才。

第四,强大的金融监管需要具备把握金融发展与安全关系能力的有强大稳定性的守夜型专业人才。强大的金融监管表现为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风险处置能力的不断上升,以及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强大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始终要把握的一对重要关系便是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是金融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强大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够较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进而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发展,而支撑监管系统的人才需要在政治上过硬,規制意识和执行力强,具备把握金融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能力,具有强大内外在稳定性。此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经过专业训练、岗位锻炼、意志磨炼,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二、强大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应坚持的基本方向

强大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方向指引,从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和纯洁性四方面出发,坚定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方向。

第一,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强调政治性。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关系到发展与安全两方面,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金融人才对于金融工作政治性的认知,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凝心铸魂。同时,完善金融系统党的组织体系,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以政治建设强化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第二,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人民性。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过程之中,是金融工作的初心所在。在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

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金融人才要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保证金融工作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夯实专业性。金融工作包含大量专业知识,专业性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运转和金融稳定的关键所在。金融人才队伍必须具备强大的专业素养,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风险控制方面的能力。金融人才要提高配置金融资源能力,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金融人才也要提高对风险的敏感性以及风险处置的专业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保持纯洁性。金融是与资金密切相关的行业,极易产生金融腐败问题,纯洁性是保持金融底色的核心所在。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指引,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同时,金融干部人才要以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要求,金融业务和管理人才要坚持金融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以纯洁性保证金融工作不变色。

三、中国金融人才培养与强大金融人才队伍需求存在差距

(一)中国金融人才队伍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人才队伍也不断壮大,无论从金融人才队伍的总量、结构还是素质上来看,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第一,金融人才总量不断增大。《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金融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740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了212万人。同时,2022年末的金融业就业人员在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比4.43%,比2012年末上升了0.97个百分点。此外,在非国有和集体金融机构就业的比例自2012年末的61.71%逐年上升到2022年末的90.87%,在国有和集体金融机构就业比例由38.29%下降到9.13%,这一数据反映了过去十年我国非国有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

第二,金融人才就业结构逐步优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金融业细分行业就业人数分别为,货币金融服务374.7万人、资本市场服务36.9万人、保险业394.3万人、其他金融业12.6万人,与2012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5.5%、75.7%、125%、80%,以银行业(货币金融服务)为主的金融人才就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在金融人才专业技能结构方面,过去十年最大的亮点是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占比不断上升,近八成银行的金融科技类员工数量占员工总数比重超2%。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截至2022年末的金融科技人员数量均超万人。未来,金融人才结构的优化会带动我国金融结构进一步优化。

第三,金融人才素质显著提升。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金融业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的人员占比为46.8%,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人员占比为7.2%。而在2012年,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人员占比为23.4%,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人员占比为2.3%。过去十年中吸纳了大量高学历人才,从业人员中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占比显著提高至54%,相比2012年翻了一番,和教育行业并列所有行业中的第一。此外,在金融人才待遇方面,金融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12年的8.97万元上升至2022年的17.43万元,仅次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所有行业中位列第二。

(二)中国金融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人才大国。然而,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强国相比,我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一定差距,金融人才培养中仍存在以下三方面突出问题。

第一,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现实需求脱节。我国高校当前的金融类人才培养模式与现实需求明显脱节,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首先,高校金融类教学内容一般滞后于金融实践的发展,关于金融科技等前沿交叉内容涉及较少,导致学生就业时缺乏从事金融科技等复合型金融岗位的能力。其次,高校金融类教材理论内容多来自国外教科书或直接采用国外经典教材,而其中对于中国金融原创性理论知识的讲解甚少,导致大多数金融类专业学生对于中国金融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尚不到位。最后,高校对于金融类学生的学习评价体系依然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重理论而轻实践,缺乏对于学生金融实践能力的培育与考核,导致学生金融实践和创新能力不足。

第二,高端和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不足。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做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等,都亟须相应的高端金融人才队伍来支撑,然而此类人才的培育数量却明显不足。以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为例,《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预计2021年至未来5年,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总量超过115万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3月末,全国共有121所院校开设金融科技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数量远远达不到需求。此外,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高端金融人才不仅需要熟练掌握金融知识,还需要在科技发展、环境科学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然而,大部分高校目前在此类新领域的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还远远不足。在国际化金融人才方面,金融强国之路必定要求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相应地需要能够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展现中国风采的国际化金融人才。近年来,国际金融组织虽然有部分中国籍高管出现,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和管理人员比例仍与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有较大差距,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

第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有效机制建设不足。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当前“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这些问题既反映现实经济金融客观风险因素,也反映了金融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和金融监管部门人才队伍建设的短板。近年来,金融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数量和金额也维持在高位,其中不乏大量触目惊心的金融腐败和市场操纵的案例。这些问题都说明,我国金融领域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树立金融从业人员正确的义利观、金钱观和价值观方面,以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加快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与优化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当前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强大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质量,亟须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人才培养机制,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充足人才储备。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第一,改进金融教学内容及教师考核机制。在金融教学内容方面,既要 will 金融发展的新模式、新技术等尽快纳入现有课程体系,增加金融科技、智能金融等方面的课程;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课程中融入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与实践,通过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丰富实践,提炼具有原创性、解释力、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

形成中国金融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特色鲜明的中国金融学教材和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对于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及现实金融问题的把握和认知能力。在教师考核机制方面,持续推进“破五唯”,使得教师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创新和学生培育过程中,打造和推广兼具金融理论与中国特色金融实践的金课,着力提升金融专业教学水平。

第二,促进金融人才培育政产学研融合。发挥好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益处,提升金融人才实践创新能力。以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需求为导向,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加强高校和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的深度合作,建立校企联动的紧缺急需金融人才培育模式。以高校理论知识教育为根基,以政府、企业的真实场景为实训场域,以解决其真实需求问题为必答卷,强化创新人才培育的目标导向,提高金融人才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加强与金融机构、信息科技或者大数据企业合作建设实验室或者开发实验教学项目,通过多方协同,充分发挥各方在金融理论知识、实验数据、实验场景问题的独特优势,提高实验教学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的成效。同时,在金融教学评价体系上,逐步改变以书面闭卷考试为评价主体的现状、打破唯绩点论,将金融实践能力作为学生能力考查的重要维度,着力提升金融人才解决现实金融问题的能力。

第三,创新金融前沿交叉领域高端人才培育模式。推动金融学科与信息科学、统计与数学等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聚焦金融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主动布局、提前谋划、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地为国家培育“高精尖缺”急需人才,解决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引领金融创新发展。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作用,创新交叉人才培育模式,自主培养造就前沿交叉领域高端金融人才。在具体人才培育机制方面,既可以通过校内资源的整合重组、成立跨学科的金融教学研究团队,也可以通过院校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构建跨校跨学科合作共建人才联合培育的新范式,为金融前沿交叉领域提供充足的战略人才储备。

第四,扩大金融人才双向开放交流。在金融人才“走出去”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选派骨干积极参与国际国内行业组织,了解行业前沿发展趋势、最新框架技术,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提升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影响力;高校可建立国际组织实习实践常态化机制,提高高校国际化人才实践能力培养和国际事务熟悉程度。通过“金融+语言”的双专业交叉融合培养,为国际组织培养熟悉国际金融运行规律、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具备国际化视野和交流沟通能力的金融人才。在金融人才“引进来”方面,编制相关的人才需求目录,强化对具有国际金融机构任职经历管理人才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技术和专业背景的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营造金融人才良好发展环境,优化金融人才生活服务,强化海外金融人才的社会认同感。

第五,加强金融人才政治和文化教育。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指引,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强化金融人才政治和文化教育。高校作为金融人才培育的摇篮,需要不断强化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同时,教师作为人才培育主体,其言行对于学生义利观、金钱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高校需要坚持党管人才,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和首要任务,紧抓教师队伍建设的规划关、进人关、培养关、稳定关和发展关,打造政治坚定、熟悉中国金融实际、传承创新的教师队伍梯队。此外,加强对于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廉洁教育、推进惩治金融腐败、规范从业人员任职和执业管理等,规范化、净化金融从业生态,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的金融干部人才队伍。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金融学教授)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 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上建设金融强国

王 擎

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 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需要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为中国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道路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相伴随。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始终坚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目标。金融强国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时代发展赋予了金融更高的要求，为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高质量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金融发展历来同向同行，始终协同共进，不断呈现新的关系与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一直遵循着两条主线，一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沿着市场化方向加快转型，二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沿着发达国家路径不断加快发展。经过40余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与需求相适应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断完善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助推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我们有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进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平稳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建立起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和产业创新质量；我们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完全取消了外资在国内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并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北向通、南向通等，实现了资本在可控范围内的双向流动；我们加速推进金融创新，在第三方支付、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领域实现全球引领；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起成立亚投行(AIIB)、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等，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推进，并于2016年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我们积极应对金融风险，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后来的影子银行泛滥、房地产过热、宏观杠杆上升以及互联网金融乱象，我们果断出台政策，审慎处置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构建起高质量国家金融安全体系。经过40余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中国金融业资产规模和银行业资产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占据5位，并排名前4，中国沪深股票市场总市值和债券市场余额均居全球第二。经过40余年的持续发展，中国金融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金融还存在“大而不强”的特点,尤其在国际金融的话语权上力量还较弱,对国际金融治理的参与程度还不高。当前全球局势依然复杂多变,大国博弈叠加地缘政治风险频现为我国发展带来较大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这一伟大目标,就是要捍卫中国发展的正当权益,直面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提升金融发展质量,实现金融“由大变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现,助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顺利实现。

(二)加强金融强国建设,有效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强国是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的战略部署,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强国建设服从、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金融强国建设坚持人民性,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金融强国内涵要求金融必须坚持“金融为民”的本色,充分展现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当前我国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城乡区域差别、收入差距客观存在。金融强国建设不断丰富养老金融等服务供给,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差距,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金融强国建设永葆绿色底色,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五大篇章之一,为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当前我国气候问题频发,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依旧不够充分。金融强国建设下的绿色金融发展通过创新绿色服务供给、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强化绿色金融监管以及助力环境与气候管理等方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第三,金融强国建设坚守服务本质,助力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金融强国建设全面服务实体经济,切实有效提升物质文明发展,并进一步为精神文明提升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

第四,金融强国建设坚持和平发展,助力世界各国共同迈向繁荣。西方金融发展是一部对外掠夺与扩张的演变史,金融霸权是西方金融实践的集中体现。中国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是人民的金融,中国历来遵循和平发展,以金融自身强大提升全球金融治理,以开放包容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二、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

金融强国建设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树立了目标,而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为金融强国建设指明了基本要求、实施路径和基本保障,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为金融强国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

一是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金融强国的“六个强大”根本上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金融之路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金融强国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二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中的金融强国目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关注人民的忧与盼、冷与暖。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成功,不能只看国家层面的强大与富裕,更要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尊严感提升来评判,要助力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强国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

一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基本要求。金融要强国,首先必须强身。中国必须建设起强大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展示出中国金融强有力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对内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外支持中国经济“走出去”,应对外部挑战,捍卫金融主权,维护金融核心价值。二是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金融强国必须和经济强国共荣共生,相互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必须着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五篇大文章”,以优质金融服务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反过来,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上,实体经济强大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三是有效防控金融风险,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安全屏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底线红线。我们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金融监管建设,有效预警风险,科学防范风险,审慎处置风险,全面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四是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责任使命。金融强国建设必须以高水平开放参与全球金融竞争与治理,开放与安全是辩证统一关系,要在开放中锻炼水平,要在挑战中提升能力。但开放必须以安全为前提,要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审慎推进开放进程,坚持渐进式原则,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三)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一是以创新推动金融发展,但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强大的金融体现在金融创新能力上,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加强金融创新,要在创新中提升服务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但金融创新必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不片面强调创新,要避免过度金融深化,要防范金融泡沫化,尤其要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要引导资本有序竞争,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于人民。二是大力推进金融强国建设,但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方法论。金融强国建设要精准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实则是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风险与增长的关系,以稳保进,以进促稳,以符合中国国情的节奏稳步推进金融强国的建设。

三、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加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一) 加强金融理论创新,构建金融强国建设理论体系

金融强国建设需要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中国在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金融发展的规律,并逐步构建起一套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体系。一是树立新目标,建设金融强国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理论新方向。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党中央在充分总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伟大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要求,提出的金融工作新目标,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使命与战略任务,为中国金融发展擘画了发展蓝图。二是实现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理论新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金融强国的精神内涵,“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①中国金融诚实守信,坚持改革开放与安全可控的发展路径;中国金融以义取利,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中国金融稳健审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金融守正创新,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执着追求;中国金融依法合规,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创新发展。三是实现新突破,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是对西方金融理论的超越创新。对比来看,西方金融主要研究资本配置效率问题,对公平正义问题很少涉及。而中国的金融并没有走资产阶级金融发展的老路,中国的金融是普惠金融、扶贫金融、养老金融。中国的金

^①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

融实践,摆脱了西方金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一元论”,而是开创了“义利”兼顾,效率与公平均衡发展人民金融之路。西方金融强调市场“有形的手”,而中国金融兼顾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在市场化发展中很好发挥了政府和国有制度的优势,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对国有金融机构低效的固有认知,在支持产业创新升级、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领域、跨期风险分担方面创新了理论供给。四是建立新体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重构了金融与政治的结合关系。金融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的稳定相辅相成。当前西方金融理论很少从价值配置的逻辑局限中脱离出来去分析与理解金融发展模式。中国坚持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强化了金融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民生福祉的现实观照,重新诠释了“金融服务于政治,金融又依赖政治”的深刻内涵。五是实现新超越,在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基础上,兼顾金融发展与风险防控,为现代金融学注入新的理论源泉。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我国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推动现代金融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更深层次的融合,在发挥资本服务实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引导资本有序流动,将资本运行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了资本的良性循环与“资本向善”,推动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二)探索金融实践经验,加快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中国金融实践,在金融强国之路上不断开拓新的实践创新。一是着力抓好“五篇大文章”,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创新。“五篇大文章”抓住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是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有效突破口。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国需要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新质生产力。我们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以数字金融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的底色,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全球绿色发展树立新标杆。我们要坚持金融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提升养老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服务面与服务效能。二是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金融平稳发展的实践创新。古往今来,历史的兴衰更替均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中国强调发展,也重视安全。中国大力发展金融,但同时也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坚持金融深化,但不盲目自由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强国建设中,特别注重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有效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三是有效统筹开放和安全,是金融均衡发展的实践创新。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金融开放的难题,把握不好很容易导致大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发展很好平衡了开放和安全的关係,既通过开放引资、引智促进经济发展,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捍卫金融安全。渐进式开放成为我国金融开放的一大法宝。在逆全球化态势下,我国坚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着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提高我国金融资源境外配置效率和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与金融治理,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四是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是金融持续发展的实践创新。金融行业需要较多的专业知识,容易出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肥了自己,坑了国家。中国从金融干部人才建设的角度抓金融,抓住了要害。要按照“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标准,培育一批专业突出、政治过硬的高端金融人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确保中国金融队伍的战斗力,确保中国金融事业不变色。五是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金融坚定发展的实践创新。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历史经验也是实践必然,是金融强国建设最大的制度优势。坚持党的领导,科学引导中国金融把握历史使命和战略要求,确保金融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利益,确保金融政策连续性、统一性,支撑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发展。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汀 兰